



漂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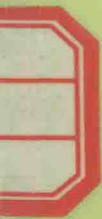
命运

下

文学的目的，是帮助人了解自己本身，提高他的自信心，激发他对于真理的企求，同人们的鄙俗行为作斗争，善于在人们身上找到好的东西，唤醒他们灵魂中的羞耻、愤怒和勇气，做一切使人能变得高尚坚强、能用美好圣洁的精神来活跃自己的生活的事情。

冯牧 柳萌 ● 主编

二/十/世/纪/文/学/名/家/代/表/作/品/精/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 二十世纪文学名家代表作品精选 •

漂流的命运

冯牧 柳萌 主编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处在中间环节的中国教练

教练员，处在中国体育的中间环节，至为关键。忧虑之中我采访了许多执教中国运动队的人们，结果更使我忧虑。

在中国体育系统，受过高等教育者不足 10%，又据对各省市体工队中教练员的来源调查发现，由运动员退转当教练的，达 81.77%，各省运动学校的教练亦有 76.61% 来自运动员。在对全国 23 个运动队包括国家队的 119 名教练的统计中初中乃至小学文化程度者，占 80% 以上。

再看一下世界体育强国，美国 1977 年全美大学生田径锦标赛期间担任教练的 49 人中，100% 为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在苏联整个体育系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达 55%。

更加令人叹息的是，在全国 3200 个业余体校田径教练员文化考核中，有半数以上的人不及格，其中有 10 个省的平均分数在 60 分以下。这些教练，大多数也是由严重缺乏文化修养的运动员退转担任的。

青出于蓝本应胜于蓝，所忧者青出于蓝反不如蓝。近亲繁殖在中国体育界又已是普遍现象。你翻开中国足球队走马灯一般频频更换的诸多教练员的名单，再观照一下国内甲级队的诸多教练员，就不难发现，甲级队的教练全是主力队员退役后担任，国家队的教头则是挂靴的“国脚”。无一例外。教练员确应是熟谙技战术又具备实战经验的人，但是，作为教练，毕竟不是以他自己踢的好赖为标准的。纵观国际体坛，许多超一流的教练并非是一个赫赫有名的球星。球王贝利虽说技艺卓绝，却无人请他执教巴西，因为他除非以连考五次的代价，首先拿到学位，然后才可问津教鞭；“凯撒大帝”贝肯鲍尔退役后，由于不曾接受必须具备的教练员学位教育，他只能以领队身份而不能以教练的身份出现在联邦德国；足球强国意大利的名队教练，上任前必须经历五个阶段的考核：





第一阶段：足球理论、解剖、生物化学、生物力学、生理卫生和心理学。及格后进入第二阶段，更深入地学习，然后由专家小组判定你有没有当教练的素质。这一下又淘汰一批人，剩下的进入第三阶段：必须到世界著名球队实习，并有写出该队一切工作计划、详细剖析该队的能力。经过再淘汰，进入第四阶段：必须参加足够的各种报告会、讲习会、讨论会以及与著名专家教练、记者会见的圆桌会议，意在考核一个教练的全部专业知识和宣传自己观点的能力。最后进入第五阶段：总体考试和论文答辩。只有全部合格，才能有被招聘的资格，招聘后还要先当助手，后执教鞭。如此“刺刀见红”的考核和淘汰制度，筛掉了不少虽然球技高超却不具备教练才能的“明星”们。

特别有趣的是，美国著名游泳教练谢曼·查尔伏，是位具有非凡组织能力的人，他执教的美国男队曾获得过16枚奥运会金牌，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世界冠军，多次打破世界纪录。可是，这位在全世界泳坛有着重要地位的大名鼎鼎的教练，却不会游泳！有一回，他的游泳队在夺魁之后，队员们高兴地把他们投入水中，以示恭贺；不料，这位世界第一流的游泳教练却狼狈地呛了几口水沉下去了，几乎葬身泳池。运动员们赶快跃入池中实行抢救。此后，他只要眼看着自己的队员稳操胜券，就赶紧悄悄溜掉，避开运动员们的恶作剧。

谢曼·查尔伏的例子说明了什么？

我们的教练员呢？虽不乏相当出色、成绩卓异者，但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常常在尽职尽责当中只扮演了一名“领操员”，“示范员”的角色，甚至领操都领不出什么新招儿来。而一名真正优秀的教练员应该像一个工程师或者艺术家那样时时具有创新的欲望和活力。谢曼·查尔伏靠的不是简单的动作示范，他并不想为运动员制造什么样板，他靠的是科学，靠一整套独特的科学的博采众家之长的训练方法。

×省女排在国内要算不错的队伍了，而一名教练却不得不去求告



一位具有高中程度的手下的队员为自己补课，以应付上级的文化考试。我们的一些教练员在执教中依靠的仅仅是自己在过去当运动员时期的训练日记，然后照猫画虎抄下来。他们制定训练计划的思维方式无非是看去年，想今年，稀里糊涂迎新年，练一段，改一段，修修补补又一段。他们认为，嘻，舞文弄墨能提高水平出成绩？训练训练，就是连训带练，你不训他不练啊，师傅就是这样把我“训练”出来的！

这么着，我们的这类教练员在代代相传的“训练”中培养着国手。他们对于一代人的经验，对他人的成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往往邯郸学步，楞变硬改。人家大运动量训练，咱也玩命干；人家无氧训练，咱也憋住气儿试试。于是，运动员练出毛病的，练伤的，练到稀里糊涂退役的，为数不少。最后他倒抱怨开了，说中国人干运动员先天就不行，人种就比人家差，不堪造就！果真如此么？前年我们请了联邦德国一位教练来华执教，他对我国两名普通田径运动员先是进行了全面测试，然后进行分析，选择出最佳训练程序，合理地安排运动量，改进了我们的教练视而不见的一些技术上的毛病，结果，只练了三个月，这两位运动员一位打破了亚洲纪录，一位打破了全国纪录。短短的三个月呀！山东足球队在聘请外籍教练前后的沉浮，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

如果一个教练员只懂得让运动员跳圈儿，蹲杠铃，翻来覆去重复那么几个动作，连最基本的运动生理、运动心理、运动营养都不懂，他手下的运动员凭什么出成绩？

这二年，体育界为了改进提高一下，让一些教练员上一两年大专班，借以改变教练员队伍的知识结构。这自然可以作一些弥补，可是，由于底子太薄，又缺乏系统性，加上有些培训进修流于形式，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质上，不过是领了一纸文凭而已。

我听说有这么一档子事情。1984年前后，中国的“文凭热”越



刮越烈。国家体委为了满足广大教练员和一部分退役运动员的美好愿望，在天津体院特意开办了一个大专进修班，以期给大伙儿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参加者有著名教练多人。在入学前，为照顾大家的基础，仅仅考试三门功课，即语文、数学和政治，考题也不难。万万没想到，在报考的几十位中国体育界的佼佼者当中，没有一人的考绩超过三门总分60分的，最高者三门加一块58分！有考30分的，有20分的，竟然还有考7分、8分的。在校专修期间，有些人并未置身课堂，仍然住在北京，只是在天津体院挂了个虚名。两载过去，每人一张大专文凭到手，“文凭发放所”胜利完成了任务。大伙儿今后就算是受过高等教育了。

这也难怪，要知道中国的各大体育院校和师范体育系，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教练系这一说。

由于我们无法像体育发达国家那样对教练员实行制度性的考核，所以我们对一名教练的优劣高低就无从作出科学判断。于是，最简便的方法也只有任人唯亲了。连锁反应的是，真正有志气有能力有实力有创造性的新人，因为没有严格的评判考核标准而常常失宠，怀才不遇的新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命运由不得自己，没有在专业上通过辛勤的奋斗而参与竞争最后显山露水的机会。于是，他们便无法摆脱那些惯于发号施令者的捉弄，无法以自身的实力去抗衡瞎指挥。这样一来，一支运动队，既可能在一位天才教练的手中创造奇迹，更可能在一个平庸者的瞎指挥中屡遭不幸。

我无法想象，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样去实行体育强国的梦？

中国足球界在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文化程度反而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要高。象李凤楼、陈成达、苏永舜等，都是正牌的大学生，钱允庆是一名有声望的医生，年维泗也是一个文化较高的青年知识分子。你看，随着这支队伍文化程度的不断降低，我们的失败也越来越



离奇：从1957年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开始，先是败给印尼，接着是在首届新运会上败给乌拉圭大学生。八十年代后，先后在重大比赛中失利于新加坡、新西兰、泰国，最后发展到输给香港。三十年来一直行进在极其曲折痛苦的道路上。当然，在今天，高丰文这颗福星所率领的中国队于党的十三大期间终于在奥运会外围赛预选中杀出了亚洲重围，可这次胜利虽然关键却仍不能使我改变观点，多少年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以及文化素质太低的问题决不会因为一场胜利而荡然不存烟消云散。在失败中的反思往往自觉，在胜利时的反思却更难些，因此也更可贵。不是么？——现行体育体制降低了中国教练的水准。

想想我们足球的战略战术吧，五十年代学习匈牙利的W·M阵式，六十年代改学巴西的“四二四”，七十年代又转而学习荷兰的全攻全守，到了八十年代更没谱了，一会儿照搬巴西的攻势足球，一会儿又推崇意大利的稳守反击，一会儿又觉得法国的欧洲拉丁派地道……真是不遗余力，孜孜不倦，偏偏没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的国情是什么？我们的特色是什么？我们的长处和绝招儿是什么？怎样去开创一条扎扎实实的胜利之路？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两年前，他在昆明海埂训练基地采访了一场高水平的足球赛。中国队对匈牙利劲旅维多顿队。当中国队以3比0战胜对手之后，对方教练吃惊非小，他忍不住问我们的一位国脚：“你们怎么能踢得这样好？”这位国脚实话实说：“就是因为没按教练的部署踢！”

多么耐人寻味的一句话。

各种技战术的背后，是完整的体育理论、足球理论，我们缺乏的正是这些。

相当一部分中国体育教练似可分成如下几种类型（当然，这里并不是指所有的中国教练）：

急于求成型。这类教练手下总有一些在运动生命的早期就表现充分的青少年运动员。但这些少年冠军们一旦步入成年的行列，便从此



一蹶不振。这一批人已经深深感到气力不支，不到二十岁就早早退役了。他们被小马拉大车式的训练搞垮了。不过，这一类型的教练倒丝毫不为此而担心，因为他手下又招来了一批新的“小马”，青少年纪录的保持者。

吃老本型。这类教练曾成功地带出过一两名优秀的运动员，从此他们便故步自封了，自誉为颇有经验了。于是他们总是要求每一个后来者统统都按照以前的那一套方法去练，全不知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老运动员型。这类人数量较多。他们的训练依据仅仅是“从前咱哥们儿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其余昏然不懂。

摩登型。这是一类比较“新”的教头。他们经常翻阅各家的体育报刊，一旦发现什么新的技术和训练法，就立即按图索骥地转用到运动员身上。对手下的运动员每年改他四五次训练计划亦不心疼。不过很遗憾，总也不见效。

抱怨型。这类教练所制定的训练计划似乎比较成套，往往是厚厚的一摞，不幸的是他手下从未出现过优秀的运动员。因为他过分地看重他的训练计划了，他致力于要编排出所谓世界一流水平的计划来。在不见成果的时候，他拍打着手中厚厚的计划，大声抱怨没有天才的运动员降临。

怒吼型。这是为数最多的一种类型。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运动员变成驴马，在他们“给我顶住！”“坚持！坚持住！”“给我滚！”之类的怒吼声中，往死里练，就结了。

诸位冷静些，看看这几种类型有没有代表性？总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科学不清醒。

我总是忘不了苏联举重队总教练换人的事情。里格尔特，是个非凡的人物。他曾被国际举重联合会主席肖德尔誉为“哪里出现里格尔特，哪里就出现新纪录”。他曾横跨三个级别，创造过63次世界



纪录，是二十一届奥运会金牌得主。他9次夺取欧洲冠军。6次夺取世界冠军。但是，苏联人看到他自1984年接任总教练以来却办法不多。拥有40多万举重运动员的苏联举重成绩在下降，屡屡败给拥有4千名举重健儿的保加利亚。1986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10个金牌，保加利亚夺走7个，罗马尼亚1个，苏联只得2个。苏联报界评论得好，说里格尔特不善于开动脑筋去研究新的训练方法，“今天大喊大叫‘坚持住！’已经于事无补”。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通过竞选，撤去了虽说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却不是个够格教练的里格尔特，换上了专家梅德维杰夫。这位新的总教练1970年至1974年曾经担任过国家队的总教练，但在当时他干得并不出色。而下野后他一直在莫斯科中央体育学院举重教研室深入研究举重理论并担任该室主任，著书立说，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写过《多年训练计划》等著作。这次复出，堪称是经过了理论和科研的重新武装。苏联报纸评论说，“关键不在于更换专家，而在于他们不同的思维”。果然，在梅德维杰夫上任后的第二年，即1987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苏联队的明显转机开始了，与保加利亚的差距迅即缩小，一举打破4项世界纪录，而保队却只打破2项。

这件事情给我很深的触动，其内涵是丰富的。伟大的里格尔特曾经63次改写了世界纪录，倘在中国，那还得了？如果这样的运动员退转后当了教练，不出成绩，我们会不会换掉他？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各级教练的事业心与吃苦耐劳精神是无可挑剔的。无论是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的教练，或是国家队的教练，哪个不是呕心沥血？他们不顾及家庭，不顾及金钱，置个人荣辱于度外，表现了崇高的献身精神。在我个人的运动生涯里和后来的采访过程中，随时可以遇到这样的人。在一位姓万的教练家庭中，他告诉我，体育界同社会的各种矛盾，最集中地反映在家长和教练员身上。每当一批孩子耽误了学业却又没上成中专班或没有被省以



上专业队选中的时候，你看吧，家长天天轮番找你，把孩子失去前程的责任一古脑推到教练头上。万教练只好含着眼泪躲起来。而你要知道，这些孩子们之所以练了两三年没有干成专业，并不全是孩子们成绩不行，而是有关头头们为了急功近利，从外省“买”来了运动员占掉了这些当地孩子应有的名额，夺走了他们应有的机会。可这又没法怨领导，因为买一个成熟的运动员，要比你自己花钱培养一个孩子成熟起来，要省经费得多！头头们的口袋里也穷啊！于是，家长受打击，孩子受刺激，教练受抨击，领导干着急。而处在风口浪尖上的，还是教练。这位万教练的妻子也是一名田径教练，她和她的同事们每天必须三上班，早晨练，上午练，下午练。夏天日头暴晒，冬天寒风劲吹，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可是她们每天只能领到五毛钱的补贴，还不够家属院里的老太太打一圈麻将呢！前些年，教练们一两年总要发一身衣服，后来，有的地方改成三年发一身，风吹雨淋，早就烂了。而体委领导们为了向市里的干部们要点儿经费，就只好一套接一套地送，或者叫长期借穿吧。有的领导干部何止接受了两套三套！他穿得了吗？穿不了没关系，给老婆穿上进厨房，给孩子穿上去上学，还能给亲戚做人情嘛！中国教练员的苦衷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比如评职称，地市一级的教练带队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几乎没有，可有的地市评定职称的框框上定了，必须有队员直接参加了全国以上的比赛才算够分。注意，是直接参加，你输送的运动员后来省里又集训又参赛，对不起，这就不给算数了！倘是足球，又规定，必须输送了七名以上的队员在省里踢主力，这才行。天啊，你算吧，假如每个地市足球教练都要输送七名以上的队员打主力才给评这个教练职称，那么，一个省，最少也要有好几百个主力队员，我们才能都够教练的格！合理不？你放眼一看，许多老教练的学生后来到大学里都当了讲师什么的，而这些教练仍然还评不上个教练职称，还在操场上带着队伍干！

就足球而言，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足球教练有着特殊的为难



之处。比如他们的自主权远远比不上足球强国的教练。中国足球运动尚植根于一片实在不富饶的国土上，足球天才还迟迟没有诞生，中国足球教练们备受管理方面的瞎指挥。香港教练郭家明在“5·19”之前可以来去自由地到内地来探秘，而曾雪麟虽多次申请却甬想去香港观阵。再加上任何一个足球强国都不曾经历的“文革”杀机，等等等等，都告诉我们，不是哪一位教练员可以一朝扭转乾坤的。但是，中国体育界的整体文化素质太差，毕竟是一个最主要的带有癌性质的突出的问题，这里头也包括足球。

中国的体育教练，就他们自身而言，谁不想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们渴望提高文化素质的心情应该说比一般的中国人更迫切些，迫切的直掉泪！责任决不在他们自己。

根源还在于我们的体制。程序是这样的：从一个尚未进行文化启蒙的少年，当了专业的运动员，退役后，再带着这样薄弱的底子，晋升为教练员，这样的教练员，再去培养没有文化的少年运动员……循环往复，后患无穷。

远离科学的人们

当今世界，仅靠教练员搞训练的时代已经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教练员、医生、科研人员和运动员的通力合作，实行总体科学训练。

然而，提起我们的体育科研，又是一番扫兴。在前些时候颁布的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中，获一等奖的只有三项，其中仅有一项是有关运动员选材研究的，另外两项一个是饮料，一个是防治末端病。1976年的汉城亚运会期间，中国的大小报刊倾其笔墨对金牌进行重点宣传，主要是围绕“升国旗、奏国歌”。但是，对于同时同地举行的亚运会科学大会，我们却宣传的极少，鲜为人知。在这个有12项研究学科的大会上，南朝鲜拿出了91篇论文，日本人拿出了62篇，台北也拿出了19篇，咱们呢？说来令人汗颜，堂堂中国大陆，只拿



出了2篇。

我们每当论及体育的成功之道，无非是“顽强拼搏”、“奋勇进取”、“为国争光”等等精神动力，似乎无须靠科学。这当然与我们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尊重知识，排斥科学作为生产力的意识有关。这是宏观上的错误。而对体育本身，这种错误就更深刻，在众人眼里，体育和科学是两个离得很遥远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体育英豪们，无论是陆上的，水里的，空中的，腾挪跑跳游滑掷，总是归入一个“练”字；所谓功夫，全凭吃得下苦，多少年习演不辍。所以沿袭而下，认为搞体育，不过是人高马大。“平时多流汗，赛时能夺冠”的指导思想贯穿始终。这里头还有一层缘由：体育科研并不能直接产生金牌，搞体育科研必定要有一定的时间，咱先抓了这阵子再说！这就致使体育科研长期以来在中国步履蹒跚。

我们一些教练们不大懂得这一套的重要。他们似乎忘记了站在科学巨人的肩膀上自己便也会高大得多。就眼下情况看，各级体委的训练与同系统的科研所是两张皮。教练们觉得科研所这帮人又讨厌又碍事儿。而科研人员又怕得罪了教练员日后搞科研更难。一位国家体委的老资历的科研所人员对我发了一大篇牢骚：

“甭提多作难啦！在别的地方搞科研那是吃香喝辣，你帮了农民的忙，除了虫害了，小枣变大枣了，老农民哪个不是千恩万谢的。可到了咱这儿，麻烦啦。你想验尿哩，想搞个什么测定哩，你瞧那个教练，绷起一张大黑脸，你就不要想动一指头运动员。你测动态，他说你影响训练计划，你测静态吧，他又说你影响运动员休息。要是科研人员发现这位教练在运动量或者强度的安排上有问题，对运动员不利，那，你也不敢明着提建议。怕啥？是你当教练还是我当教练？人家说的好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家的师傅就是这一套，你咋呼啥？我说你们这帮教练咋就连农民都不如？老农民还懂得用科学比死受实惠哩！……再一说，运动员也烦，他也以为你给他添乱



呢。这么着，一个科研项目总是拖拖拖，好不容易搞下来，你还得领人家教练的情，哈，倒成了是人家帮你完成任务啦！

“还是人家老外精。咱们花钱请来的外国教练，够高级了吧。可人家三天两头往科研所跑，依靠的就是个科研所，和咱们科研所搞得关系很好。像那个德国教练，每天训练都要参照咱科研所的数据，离了数据他不干。咱们的教练你求他去测试，他讨厌，可人家是主动带队来所里测试，人家还怕你马虎哩！老外说，他们在国外，动用科研单位是要花钱的，说社会主义好，不用花钱就办事。所以他就老跑科研所。咱们的那帮教练，你请都请不来。唉，反过来说，咱们的教练也不是不想依靠科学，他不想出成绩？实在不是他不乐意来，是他那点儿文化水儿，来了也没用！就算交给他那些数据，他还是个稀里糊涂，睁眼儿瞎子。

“唉，提起科研所的事儿，我就气。要是拿回金牌来，你看领导上那个热闹劲儿，要是你的科研论文在国外获奖了，谁稀罕你？不管哪一茬的领导，那精力就是集中在训练部门，集中在奖牌那儿啦。就这架势，建体育强国？难哪！”

这时我想起当代杰出的体坛巨星卡尔·刘易斯的教练汤姆·特雷兹博士的一句话：“不妨说，刘易斯正是我30年来从事生物力学研究的结晶。”

是啊，那位老人的话和博士的话发生共振，使我震惊。在中国，要向科学进军，难啊！

人才的滞留

又是一个现今体育体制包括竞赛体制带来的大弊，不容回避。

尽管人们并不否认体育人才交流的重要，但若是真的试图去挪动他人领地一兵一卒，你非吃闭门羹不可。解放军队的教练在一次国内比赛后提出，能否从其他省市代表队中每一个项目的第十名之外，调



配给他们一些队员，结果遭到各地拒绝。十名以外也不行，赶明儿让你们给练好了出来打掉我呀？

1985年10月，美国应聘到我国执教的田径教练丹尼斯，在郑州青运会上遇到了他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的问题。那些在田径项目上夺得金牌的青少年运动员，在他看来大多缺少继续提高的条件，前途不大，而那些有着明显潜力的运动员，他们本省、本地区的教练又不肯把他们交给丹尼斯。这种尴尬的滋味丹尼斯并非第一次尝受，他在1984年一到中国不久就体味过了。

地方主义正是造成丹尼斯困惑的直接原因。以至于中国体育的后备力量非常不妙，人才滞留。

这里有一份××省体委于1986年3月下发的正式文件，严令禁止体育选手外流。文件先是通报了该省两个市的一些运动员被北京航空学院、北京体院竞技体校和八一队“私自招走”的情况，然后作出如下特殊规定：

一、凡外省、市、区、解放军、全国性产业体协到我省各级体校选招运动员，必须持有省市自治区体委或同级的介绍信，经省体委同意加盖公章后，在指定的地市县选招，如手续不全者，各地市县有权拒绝选招。

二、凡高等院校招收各级体校运动员，必须经当地体委同意，报省体委批准，并要严格按照招生手续，未经当地体委正式推荐和省招生办同意，一律不准乱拉运动员。

三、(略)

四、对于不通过上述正常手续，乱拉运动员，各级体委要通过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予以制止，并及时上报省体委。对于不听劝阻者，省体委直接向各省市、自治区、国家教委、总政治部等有关单位或部门提出交涉，必要时报请国家体委



通报全国。对于各级体委中个别人搞私下交易，或知情不报者，一经查清，坚决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五、……追回流失的运动员，并将追查情况上报省体委。

这个文件是三月份下达的，到了五月，省教育厅和省体委又联合颁发了《关于严格控制体育运动人才外流的几项规定》，特意在原来基础上加了一条更厉害的：

对于各级各类体校中个别教练员私下搞交易，徇私舞弊，放走人才者，一经查清，根据情节，将降低、撤消或不予评定技术职称，直至调离教练工作岗位。如发现教育、公安等有关部门中个别人有类似情况，建议同样给予相应的纪律制裁。

看这文件，多具体。

中国在改革的时代，科技人才要流动，管理人才要流动，教学人才要流动，工农业各条战线的人才都可以流动，这是改革开放搞活的需要，所谓“树挪死，人挪活”是也。为什么最具有活力的体育人才无法流动？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体育体制、竞赛体制带来的结果。

象××省这样严令禁止人才流动的，绝非一家，可以说，几乎家家如此。偌大的中国体育界，颇有些“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的味道。统统为了一个目的：金牌。

河北省自行车队1987年以来让人刮目相看，靠的就是人才的引进。6月，该队不满21岁的赵焱大幅度地提高了女子1000米计时赛的全国纪录，从而使中国诞生了第一个计时项目的自行车国际健将。7月，河北女队又创造了女子3000米团体追逐赛的全国新纪录。令



人惊异的是，这支令全国同行和新闻界关注的劲旅，建队还不到三年，何来神力？原来，该队教练王振新，是从自行车运动的强省山西——步入运动生涯而后回归河北的。这个王振新在河北执教以来，又受到山西的热情关照，——哥哥是山西体育科研所的领导，嫂嫂是山西省体委的副主任。这样，山西队几十年来的成败甘苦顺风逆境，在王振新那里全不成秘密。加上有了这层“血缘”关系，山西派出了一位最了解、最熟悉中国唯一在世界锦标赛中摘取过自行车奖牌的著名运动员周素英的人——周素英的未婚夫，前往河北助阵。结果，赵焱与周素英的风格竟十分相似。山西助阵的作用不言而喻。

这件事说明两重意思：河北队倘若没有借助山西的力量，站在巨人的肩头以助高，显然不会进步如此神速，说明人才交流之重要；但是，援助的契机，却是兄弟血缘。那么，倘若没有这层关系，山西的人才和智慧就极难交流到河北去。此事又反过来说明了中国体育人才交流的困难。

一家人才济济，内部消化不了，另一家人才奇缺，上下无法配套，这个现象实在不是唯体育界独有。而体育界由于自身体制所决定，又由于多了一个金牌的因素，金牌又直接关系到一个省、一个地区的体育官员的荣辱升迁，所以这现象就显得严重得多。整个体育界的人才浪费十分惊人。

还是山西省。这里从五十年代就打下了雄厚的摩托车运动的基础，四届全运会前后山西健儿曾铁骑出山，纵横驰骋在北中国，产生了一批健将级选手和国家特级摩托车手，群众非常爱戴。到了五届全运会，由于大会没有设立这个项目的金牌，山西省体委断然将这个项目下马了（不排除经费困难的因素）。铁骑不再咆哮，铁流不再奔腾，军体大院里出现了少有的寂静。几十辆摩托车在庫房里沉沉睡去，灰尘渐渐地覆盖了它们，锈蚀毫不客气地在吞蚀着它们。人呢？这是比那些赛车更宝贵的。这些摩托车运动健将和特级车手们，带着



一身老伤，作鸟兽散，各奔前程去了，有当卡车司机的，象范建议，有干邮递员的……另有一批无路可走的骨干，留了下来，闲着，心里发慌，无事可干。好几年前我就常常在太原街头遇到健将小白，慢悠悠地开着个偏三轮，在菜铺子跟前讨价还价，然后拉上一篓子菜回去给更多的闲人们做饭。而今，那辆偏三轮残破得气也喘不匀，一天天见老的健将小白还时而开着它跑菜铺。一晃间，六个春秋过去了。近七年来，这群热爱摩托车事业的闲人们向省政府有关领导、向省体委打了多次报告（笔者本人还替他们向副省长的秘书递过一回），要求领导上能够恢复这个项目。并提出，如果领导上经费确有困难，他们可以成立摩托车协会，自费办队，或民办公助。眼见得并州街头成千上万辆的民用摩托车奔驰而过，无数的年轻人对摩托车运动有着浓烈的兴奋，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不可以把大家组织起来办摩托车事业？为什么不可以以车养车，一边搞为民服务的短训班，维修站，一边注意培养苗子，建立队伍，将来为山西、为中国效力？这样办，既为国家节省了资金，又为民族培养了人才，他们自身也产生了新的价值。这是一群身怀绝技的人才呀！

但，这报告泥牛入海了，记得那位当年的摩托车教练，曾在车场上冲锋陷阵九死一生。那天他开着小白买菜的那辆车，叫上范建议，拉着我跑省府大院，跑那份报告。希望一一破灭之后，他怅然地驾驶着车，把油门松到最小，任车轮缓缓向前滚动。良久，这位征战沙场半辈子不曾低头的中年汉子，凄楚地对我说：“只要他们让咱干成这个事业，活着别像个死人，咋都行！”

我久久地沉默着……

谷雨的奇遇

东北游泳界有一位很不错的少年运动员，名叫谷雨，1972年出生，年龄小，身体条件好。在齐齐哈尔训练两年，曾获全国少年儿童